

对一张重要历史照片的考证

王文波



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部分委员合影

光影史话

这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历史照片。关于该照片，有的机构标注“毛泽东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1949年10月1日)”;有的机构标注“1949年10月,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部分委员合影”;有的机构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部分委员合影”;有的图书资料标注的拍摄时间为1949年9月。当然,大多数标注的都是1949年10月。

面对该照片,人们经常会有两个疑问:该照片的拍摄时间到底是哪一天呢?照片中为什么没有副主席宋庆龄呢?

拍摄时间不是1949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于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选举产生的。当天下午投票之后,选举结果统计公布之前,大约6时,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之后返回会场,报告开票结果,并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等文件,举行了闭幕式。会议结束后,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会餐。

如果说该合影为9月拍摄,那只能是9月30日散会后。但是,该日的选举、奠基典礼和闭幕等重大活动,宋庆龄都参加了,如果安排合影,她没有不参加的道理。此种情况,还涉及柳亚子等人。另外,此种规模的大会(当天630多人参加),如有合影环节,一般都会安排在会议程序里有安排,而且也应该会有相关的照片流传开来。但查阅了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大会日程和每日的程序,都没有安排合影。

而且,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部分委员”合影照片看,虽然大多数人穿的衣服看着不是太清晰,但与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会议的穿着相比较,依然能够看出明显的不同。特别是朱德,在闭幕会上穿的是有胸标的军装,而在合影照片中穿的是便装。合影的背景是南海勤政殿,但该日的会场是在怀仁堂,似也不合理。还有一个旁证,黄炎培在其日记中有多处关于会议合影的记载,但在该日的日记中却没有。

综合以上分析,合影不可能是1949年9月拍摄。

拍摄时间不是1949年10月1日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会议。内容主要有,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下午3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从会议内容上看,会后安排合影的可能性确很大。但从时间上来看,2时开会,开完会后合影,然后在3时前赶到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是不太可能的。典礼后又举行了近3个小时的阅兵式,之后是30万人的群众游行。晚8时,举行宴会,欢迎苏联代表团。因此,该日组织委员们合影的可能性也不大。

从会议签到表和和相关影像资料来看,宋庆龄、柳亚子等人都参加了下午2时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3时的开国大典,如果安排了合影,他们没有理由不参加。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合影中人员的穿着。毛泽东等人在合影照片中穿着的衣服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照片中,毛泽东穿的衣服是有明显褶皱的旧衣服,开国大典上穿的是没有褶皱的呢子制服;刘少奇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开国大典上穿的是浅色衣服;朱德穿的好像是深颜色的便装,开国大典上穿的则是土黄色呢子新军装,不太可能拍完后临时换上新衣服。

还有一个细节非常关键。受时间紧迫和材料紧缺等限制,当时仅制作了两面特大规格的国旗,1949年10月1日都在天安门广场升旗备用。因

此,在该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悬挂的国旗明显比合影中悬挂的国旗规格要小,大厅立柱上每处壁灯上边插的五面小红旗也不是国旗。而且,会议现场照片中的绿植也与合影中的明显不同。

会不会拍摄于10月3日?

10月3日晚8时30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建交的报告;研究苏联政府同原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立场,决定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任命王稼祥为中国驻苏联大使。会议同意外交部发出声明,通知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交接。9时召开晚会,苏联艺术演出队表演歌舞。

笔者能查找到关于此次会议的资料比较少,之后几日的《人民日报》也没有相关的报道(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们观看苏联艺术演出队的表演,10月5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进行了报道)。但从会议内容和时间安排来看,这个会议时间非常短暂而紧凑,很有可能临时召集且保密,所以此日也不太可能组织合影。同时,这次会议与第一次会议时间间隔只有一天,换上超大规模国旗并对现场进行重新布置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很有可能是10月19日拍摄

1949年10月19日下午7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笔者认为,这张照片很有可能是这次会议后拍摄的,主要基于以下分析。

首先,从会议内容上看,会后组织委员们合影的可能性很大。其次,据《宋庆龄年谱长编》记载,宋庆龄于该月14日离京南返、16日凌晨1时到达南京下关,因此缺席了该日的会议。国家档案局官网《共和国脚步——1949

年档案》专题片第43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政府各项负责人》中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记录”,柳亚子和宋庆龄、龙云等一样,在该次会议记录中是“缺席者”,并注明“皆不在京”。再次,黄炎培在该日的日记中写道:“摄影。十时散”。极有可能就是指的这张合影。黄炎培在记录参加其他各次中央政府委员会会议时,没有关于“摄影”的记录。而在同月21日的日记中,有两次关于摄影的记录:一次是上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后,座谈、摄影、会餐;一次是下午和晚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会议中间“摄影、会餐”。相关的照片都能看到。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小细节,在国家档案馆官网的合影照片上,有一个挂钟。虽然比较模糊,看不太清哪是时针、哪是分针,但要么是12时45分,要么是9时5分,很明显不可能是2时至3时之间。大概率是9时5分,正好跟这次会议拍摄的时间相吻合,说明该合影很有可能拍摄于19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该合影不太可能是拍摄于1日下午的第一次会议。

1949年10月16日,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后合影。从合影来看,为了迎接新中国外交史上首次接受国书活动,对勤政殿进行了修缮,此时具备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部分委员合影”拍摄的背景条件。

紧接着,1949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及21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时均留下了合影。这些都增加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部分委员合影”拍摄于1949年10月19日的可能性。

(本文为作者为中国政协文史馆研究部主任)

斯舅舅》等作品中的几处用语,他与法国友人反复商讨,清楚了才定稿,还特地加了注释。1942年,他曾翻译法国作家杜哈曼的《文明》,不太满意,1947年3月,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一顿”,交给南国出版社出版。20世纪50年代,傅雷翻阅自己10年前的旧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感觉不理想,从1952年6月到次年3月,花了大半年的工夫,特地校订修正了全书,直到“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才放手。

事实早已证明:凡是在某个领域真正星光闪烁的人都是背负过生活的重量的,区别只是在有人是被动,有人是如傅雷一般自愿。

敢于背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得大量消耗心神、精力,有时还得牺牲可能得到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内心必须承受会不会有人“看见”自己努力的生命拷问。然而,播种、收获有着内在的关联,一个人主动追求难度,别人想与我们并驾齐驱便不那么容易,我们也就能在人所不及的生命海拔上内射出持久的光芒。

傅雷如此,历史与现实一切成就大业的人大都如此。

文人逸事

梁启超首提“中华民族”

周惠斌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是由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提出的。

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了一篇题为《东籍月旦》的文章,首次使用了从日语翻译而来的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如“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民族竞争”等新名词。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代:“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缛、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1902年,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又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围绕“中

华”的内涵和“中华民族”一词,感慨地写道:“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梁启超以“中华民族”取代了之前的“中国民族”,这也是中国人在海内外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并沿用至今。

此后,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概念作了厘清和完善。1905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一文,对“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革命性创造,指出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人,是多元、混合的一个共同体,为消除民族歧视、促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团结、统一,发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从此,“中华民族”一词,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凝聚起国家和民众坚定维护统一的意志,成为中国走向统一和实现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汪曾祺感念师恩

崔鹤同

汪曾祺年幼时曾入江苏省高邮县第五小学设立的幼稚园,是幼稚园第一届学生。王英文先生教他们唱歌、跳舞、做游戏。年届花甲时,汪曾祺对老师教的儿歌、演的小剧目记忆犹新。小剧目剧情很简单,音乐曲调也很简单,但是感情却很丰富。所有的歌舞表演都是王英文先生一句一句教会的。他们在表演时,王先生踏风琴伴奏。

汪曾祺在五小毕业,后来又读了初中、高中,人也大了,就很少到幼稚园去看看。19岁离乡,四处漂泊,一直没有回去过,也一直没有再见过王先生。王先生和汪曾祺的初中的教国文的张道仁先生结了婚。汪曾祺长大以后才知道。

1981年秋,61岁的汪曾祺应邀回阔别40多年的家乡讲学,特地带了一点北京的果脯去看王英文先生和他的爱人张先生,并给他们各送了一首在招待所急就的诗。给王先生的那首不文不白、毫无雕饰。第

二天,张先生带着两瓶酒到招待所来看汪曾祺。汪曾祺说,哪有老师来看学生的道理,还带了酒!张先生说,是王先生一定要他送来的。说王先生看了他的诗,哭了一晚上。这首诗全诗是:

“小孩子乖乖,把门儿开开,”
歌声犹在,耳边徘徊。
我今亦老矣,白鬓盈腮,
念一生美育,从此培栽,
师恩母爱,岂能忘怀!
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

张先生告诉汪曾祺,王先生曾对他说:“我教过那么多学生,长大了,还没有一个来看过我的!”王先生指着“师恩母爱,岂能忘怀”,对张先生说:“他进幼稚园的时候,还戴着他妈妈的孝!”汪曾祺这才知道王先生为什么对他特别关心、特别喜爱。张先生反复念了这两句,连说:“师恩母爱!师恩母爱!”

程砚秋说功名

王吴军

程砚秋是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他在舞台上塑造的栩栩如生艺术形象,深得人们的喜爱。但是,成名后的程砚秋依旧勤奋练功,没有丝毫懈怠。

有一次,程砚秋看到几个在舞台上表演抬轿子的轿夫的演员在练功时步子走得非常稳当,就想到自己在舞台上的台步功夫,从中受到了启发,就跟在这几个演轿夫的演员后面练起了台步。后来,他又专门到这几个演员家里去拜访求教,凡人告诉他,他们平时为了练好台步,总是用头顶着一碗水,一步一步地练习,才练出了非常稳当的台步功夫。

从此,程砚秋也开始坚持每天找时间,头上顶着一碗水,一步一步地练台步。

刚开始的时候,他总是练不好,练得腰酸腿疼还是不行。但是,程砚

秋并不气馁,仍然坚持不断练习。有人不解地问程砚秋:“程先生,您现在已经是大名鼎鼎的著名演员了,何必还要每天这么刻苦地练习台步呢?您这不是自讨苦吃吗?”程砚秋笑着说:“不论做什么,好的功夫都出自勤奋,没有勤奋的付出就没有好的功夫,没有好的功夫就没有真正的好名声。人们常说,功名功名,我觉得,好的功夫和真正的好名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真正的好功夫,才会有真正的好名声,不然,即使有了名声,也是徒有虚名。”

后来,程砚秋经过勤奋练习,终于练成了头上顶着碗行走如飞却滴水不洒的台步功夫,他又经过自己的艺术创造,形成了一套别具风格的稳重、端庄、灵巧的台步,使得他创造的“程派”京剧艺术更加美好动人。

吴青霞捐棉衣

刘兴尧

1937年8月13日晨,驻上海日军以冲入虹桥机场的士兵被击毙为借口,向驻守在八字桥一带的中国守军发动突袭,停泊在吴淞口海面的日本军舰也以重炮轰击上海市区,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拉开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序幕。

由于淞沪会战进入第三个月,转入秋凉,眼看寒冬将至,很多士兵还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

上海大画家、丹青女圣手吴青霞和自己的姐姐、妹妹们非常着急,决心为将士们做点什么,吴青霞决定和姐妹们一起缝制棉衣,送给将士们御寒。她和姐妹们流水线作业,孩子们打下手,日夜加班,短时间内做成棉衣数十件并亲自送到前线。

吴青霞是老六,孩子们都叫她

“六姨”,据她的外甥回忆,六姨不但棉衣缝制得好,那针脚的整齐程度让他们都怀疑是机器做的,而且,六姨还是书画家,用她的特长在每件棉衣领子上分别写下了“奋勇”“必胜”“无畏”“杀敌”等激励词汇,鼓励战士们奋勇杀敌、抗战必胜,也表达了她的同仇敌忾之意。

吴青霞虽然是一介女流,但在那种情况下,她能冒着炮火,把棉衣送到战场上、送到战士们手中,表达了一个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试想一下:吴青霞冒着头上落下的炮弹和身边嗖嗖飞过的子弹,扛着一大包棉衣在战壕里穿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吴青霞的这一行为,充分诠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民族精神。

傅雷的背负

游宇明

在当代翻译家里,傅雷应该是个光芒四射的名字。他只活了58岁,却在37年的工作时间内翻译了500万字的译文,共30多部,涉及文学、美术、音乐、政论诸多领域,数量之巨让人惊叹。在这些译作中,巴尔扎克的多部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巨人三传》最为知名。傅雷逝世许多年后,其儿子傅敏编辑的《傅雷家书》也流传极广,人们着迷的不仅是傅雷在信中阐释的家教理念,还有优美的洋溢着诗情和哲理的文字。

傅雷卓越成就的背后,是其非同常人的背负。

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时上海已经沦陷。他“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

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选择翻译这部作品,并非出于市场考虑,而是期待一个热血青年“在绝望中重新燃起生的希望”,寻找反抗外敌的道路。在他看来,比国土沦丧更可怕的是一个民族人心上的塌陷,只要人心不死,国土终究有被收复的一天。

傅雷在个人操守方面追求至纯至洁,在专业追求上也自树高标。众所周知,傅雷以翻译法国作品见长,其实,傅雷的法语早年并不好。1954年4月7日,傅雷写信给远在国外的傅聪,专门谈到这件事:“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学得很不成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岁出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和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语,教师读本和文法,房东太太

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

勤奋提高了傅雷的外语水平,也塑造了他文学修养的高度。傅雷经常阅读法国作家作品,了解其长处,明白自己的短板所在;他又喜欢阅读中国作家作品,有意捕捉汉语中一些精妙用法,在自己的译文中化用。傅雷的翻译因此自成一派:优美、流畅、富有神韵、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傅雷对自己译作的要求,完全可以用严苛概括。动笔之前,“熟读原著,不厌求详”“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一旦动笔,会对原文的遣词造句细心揣摩。为了解《贝多芬传》的创作缘由,他专门与罗曼·罗兰通信;希望弄懂《贝姨》《邦